

黑牢進出(二)

——延安縣長歷險記

高仲謙(曾任延安、洛川、米脂等縣縣長。大學教授，現任國民大會代表)

施展宣傳統戰手段

中共「解放社」的動作很快，那是專門刊印中共宣傳品的地方，位在延安城東過延安河的一處山坡邊的洞穴裏，那個洞叫萬佛洞，中共借用這個洞穴的天然形勢，將其裝修佈置成一處傳佈赤色毒素的大本營。

「解放社」與我住的地方相距不近，然而毛澤東的親筆信送來沒兩天，他們就將各種中共資料全都送了三份來，將我的窩洞堆了個滿坑滿谷。

中共希望我「看一看」這些資料、宣傳品，如果我被這些宣傳品給迷惑了，最好！就算我不被迷惑，只要縣政府有人好奇的看一看這些資料，他們也就達到宣傳的目的。

與中共打交道多年，感觸最深的是共黨靠宣傳與統戰的顛覆破壞力量竊據了整個大陸。

有一次，我與毛澤東聊天，毛澤東突然很有興趣的問我，「高同志：你每個月待遇如何？够生活嗎？聽說國民黨政府的人員待遇都很優厚，你日子應該過的不錯嘛！」

我被他這一問，楞了一下，不知道他到底有何用意，當下就很老實的回答：

「也沒多少錢呀；我是依政府規定每個月領法幣一百八十元，家人衣、食、住、行及一切開支，應付下來還蠻緊的，不能算是待遇優厚，國難當前，我們是當省則省。」

毛澤東聽了我的回答，當下眉開眼笑，如獲至寶，他立刻大聲的說：

「唉喲！高同志，每月一百八十元已經是好的不得了了，待遇了，你怎麼還嫌委屈呢？你要知道，我們共黨可才是真正的重視目前國家正面臨困難、國勢艱危，而每人都勒緊了肚皮作事。」

「你看，我雖然是共產黨的最高負責人之一，但是爲了國難當前，我們共產黨沒有階級、沒有上下的劃分，人人一律平等，皆是同等待遇，我們紅軍的一個戰鬥員每個月領五元薪餉，我也領每個月五元的薪餉，我們共產黨內還不是人人過的快快樂樂、積極奮進！」

我一聽毛澤東這麼講，知道差點又上了他宣傳的大當，因爲當時中共在向國際間大力宣傳中共的「簡樸」，「苦幹」，他們爲了使世人以爲

是「土地改革者」，而掩飾其暴力叛亂的本質，就不遺餘力的塑造一些中共黨員是「特殊材料」「不要錢、不要名、只知苦幹實幹」等一類的神話。

「中國共產黨由上至下每人每個月只領法幣五元薪餉」正是中共極力宣傳的花招之一，中共希望藉著這花招迷惑世人，誤以爲中共領導幹部個個「充滿熱情幹勁」「清廉正直」，與他們宣傳的「腐敗的國民黨」大有區別。

因此，毛澤東與我的對話，絕不是隨隨便便與之所至的聊天，而是經過其事先「設計」，想來套我的話。

只要我一承認政府官員的待遇確實優於中共，並基於客套而向毛澤東說：「你們實在真辛苦，拿那麼少的待遇！」中共就可能藉機大作宣傳，強調「國民黨派的縣長都『誇獎』共產黨『堅苦卓絕』的勤樸精神與意志！如此一來，豈不是我也變成了中共的統戰宣傳工具？」

這種當，我可不會上，憑着與共黨多年的交手經驗，我已經知道毛澤東他說這一段的真正目的何在。

月亮像燒餅啥好看

談到待遇我也毫不客套，直率的正色告訴毛澤東：「毛先生您太客氣了；沒錯，我每個月拿的是一百八十元，但是這一百八十元要付家中的的一切開支，我們還捉襟見肘呢！那像您，雖然每個月只領五塊錢，但是您一切開銷都不必花錢，比較起來，我一百八十元不夠用還經常得拿私蓄補貼，您的五塊錢却可完全留下來，生活比我過得富裕優渥，過的舒服，我可以與您交換！」

我這麼的「頂」毛澤東，使毛澤東感到很是尷尬，他呵呵的笑了一聲把話轉了開去，不再針對這個問題與我談了。

我之所以敢頂毛澤東，是因為當年延安的情形確實是「以宣傳掩飾一切真相」，外地的人或許會被毛澤東那種「我跟士兵一樣每月只領五元錢待遇」的說詞所迷惑，而以爲共產黨真的是「革命的幹勁冲天」。

但是延安當地的民衆却知道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宣傳花招，沒有人相信共黨的宣傳，因此我才敢大膽的頂毛澤東，並揭穿他的虛偽假話。

我們在延安的人固然知道共黨的話虛偽不可信，但是其他地方的人却不知道，在中共刻意的宣傳下，許多不滿現實的純潔的年輕人因而受騙，如年輕貌美的唐克清，因為崇拜英雄，下嫁朱德，到軍政大學受訓，還有許多女大學生，認爲延安是「革命的聖地」「中國的新希望」，滿懷熱情的投奔延安，希望能自我犧牲來從事「革命」。有一位美麗聰敏的女大學生，因爲不滿現實

，由政府區，投奔延安，從事革命工作。這位小姐抱着犧牲奉獻，一切爲革命而努力，下嫁了又紅又專的長征幹部，這位幹部識字不多，頭腦簡單，當然談不到精神生活。在一個鳥語花香的禮拜六的夜裡，這位女大學生提議和她的愛人（夫婦）一同外出散步賞月，這位長征幹部的答覆是「月亮像燒餅一樣，有什麼好看？」女大學生得到丈夫這兩句令人掃興的答話，不禁感慨萬分，自嘆命苦，好似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面，在萬分無奈傷感的情況下，寫了一首七言絕句：

嫁得郎君不解情，強把月比的燒餅，
從今不盼禮拜六，春宵枉自值千金。

這一首首很快傳遍延安抗大校園，許多女孩子讀後都感到難過無奈，許多知識青年、男孩子都和女生們一起鬧起情緒來，事情很快就傳到毛澤東那裡，這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君，專門以饑餓來控制人民的獨夫，依韻寫和了一首七言絕句，來批評溫情主義的不當，毛澤東的詩這樣說：春花秋月枉多情，天上人間兩畫餅，
寒來花月不能衣，餓時一餅值千金。

最後，許多年輕人是遭到了徹底失望的打擊，有些個性耿直的年輕人，因失望而反抗中共，最後遭到中共殘忍的迫害與殺戮。

像毛澤東、周恩來這些大頭目，享受奢侈豪華，那些投奔延安來的青年學生經常每天只能吃到兩頓小米稀飯，穿著補釘、單薄的衣服，共僑們人人吃「小廚房」的佳餚美食，還不時蒐集補品來「進補」，享受之奢侈令人爲之側目。

當年抗戰的艱苦時局，人人生活過的都很苦

，一般人吃些粗糧雜食，菜只有小小一碗。一個冬天，紅蘿蔔一吃就是好幾個月，夏天吃南瓜，也是一吃好幾個月不換其他的菜。

一般民衆那麼艱苦，共黨頭子却從不會「虐待」過自己，中共自我誇耀絕沒有「階級」的劃分，但是延安城內只是「吃飯」一件事，已經可以嚴厲的階級差別待遇了。

有關毛澤東他們這種欺騙宣傳的實例，我還要舉出一點，由實例中可看出他們的「演技高明」。

中共爲了宣傳延安是「神聖的抗日根據地」，曾邀請外國記者到延安「考察」，藉這些記者的口替中共宣傳。

一般人邀請別人來參觀自己的處所，總會先把家中打掃清潔，拿出最好的一切招待客人，給別人好印象。但毛澤東不是如此，參觀者到延安時，所看到的是經過刻意修飾要「表現艱苦抗戰、意志昂然」的延安。參觀者到延安接受樂隊、儀隊，歡迎他們讓樂隊、儀隊的成員穿的破破爛爛，補釘東一片，西一塊，看起來寒儉破舊不堪。

中共知道外國記者最喜歡發問，他們故意將隊伍作這種打扮，以勾引外國記者的發問。這些隊伍的成員事先被教好了的應對內容，記者問他們爲何穿得單薄、破舊，這些人挺起胸膛大聲回答：「國家正處國難時期，我們共產黨人人不怕艱難困苦、不求生活享受，衣服有得穿就夠了，別看我們穿的不好、過的不好，打起日本鬼子來我們可是最在行，與日本人戰鬥我們是每戰必捷

，每役必勝。」

不知延安真相、中共實際情形的人，看到共黨人員在如此「惡劣」的情況下，仍然「熱情、有勁、充滿了活力與朝氣」，怎會不被騙得團團轉？這只是中共導演「延安騙劇」的第一步而已，外國記者、政要訪客踏進延安城，自始至終被籠罩在中共的欺騙之中，始終看不到一點真相。

毛澤東自己也常參與這些騙局的演出，有時，他招待記者政要來賓，故意的找些缺了角的茶具、杯子放在桌上，再在談話中強調一下「我每個月也只領五元薪餉」「共產黨上上下下全部平等，大家共同為國難犧牲奮鬥」之類的假話。

由於共酋們「導戲」縝密、「演出」週詳，使得「延安過客」信以為真，於是他們離開延安回去後，就變成了中共的「義務宣傳員」，為中共鼓吹。

當年除了與毛澤東、周恩來等共酋打交道外，還有一些中共中級幹部也與我很熟，其中有一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」蕭勁光，後來作過中共的海軍總司令，當時他是我與毛澤東聯絡的中間人。

日機轟炸延安，將我的辦公處所縣政府大堂炸得稀爛，那次轟炸，蕭勁光就躲在縣政府外邊的防空洞裏，炸彈落下的地方離他不到兩丈遠，算他命大。

俗話說「閻王易見，小鬼難纏」，如果毛澤東是閻王的話，蕭勁光就是那難纏的小鬼，因為毛澤東最善於扮白臉，凡事他都說「好！好！好！好！好！但真要毛澤東幫忙時，毛澤東不見了，留下

蕭勁光當「黑臉」搪塞。

那次轟炸後，縣政府的大堂被炸燬，我們無法辦公，沒奈何只得搬至延安城外一處飛機場辦公密洞，內有飛行員宿舍，空了十幾張床位，可作縣政府員工、眷屬的住宿之處。

但是辦公處所還是付之闕如，因此，我就決定發動民衆協助在宿舍附近多挖幾個密洞作辦公處。挖密洞在陝甘黃土高原上本是稀鬆平常的事，因為黃土高原土質的關係，很適合挖洞居住，很多人寧可住密洞，不願住房間，飛機場宿舍本身也是密洞，幾乎每個人都有打洞的經驗與技術。

因此，剛開始我還以為挖洞當辦公廳應該沒甚麼問題，很快就可以辦好。

不料，不管我們怎麼找人，就是沒有民衆願意來幫縣政府挖密洞，縣政府出公告也一點用都沒有，不但沒有人來幫我們挖，甚至還有民衆前來阻止我們挖，使工程停了下來。

我私下一問，才有一些平日要好的民衆告訴我，不是他們不願意，是中共惡意在阻撓，中共派人警告他們，要他們「不可以幫縣政府作事」，那些阻止我們挖的「民衆」是中共幕後所唆使的。

我一聽之下，心想：「糟了，該不是中共又想像逼走馬濯江縣長一樣的，也想把我給逼走吧？」

我後來想：「應該不會呀！我『和而不同』的作法，至少已經與中共高級幹部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友誼，他們何必出此下策呢？」

此一變化令我東猜西想不得要領，最後，我決定直接找蕭勁光想辦法，因為他擔任「八路軍後方留守處」主任，等於是中共在延安的總管，只要找他幫忙，縣政府辦公室的工程問題應該不難解決才是。

蕭勁光的辦公地點在一密洞中，我去時，他先藉口有人在辦公室裏有事，讓我在門外等了很久時間。

好不容易他走了出來，我正預備與他詳談，他却說：「正好我要出門，咱們就邊走邊聊，看看你到底有些甚麼事？」

我與他一起向密洞外走去，沒走幾步，就有縣政府同事很焦急的來報告說：

「縣長，不好了，有七、八十位民衆在那裏阻止我們打密，不許我們挖密洞！」

怎麼辦？我心裏清楚的很，就是找「八路軍後方留守主任」來辦，我問蕭勁光：

「總不能讓縣政府沒有辦公場所，蕭主任，你看該怎麼辦？」

蕭勁光心中有數，阻撓縣政府挖密洞的本是他們共產黨，我問他怎麼辦，他怎能回答得出來呢？

因此，他支支吾吾，口中喃喃的說：「這個要開會決定、要開會決定！」

我們倆僵持站有一會兒，我看蕭勁光實在是沒有主見，才說：

「這樣好了，蕭主任，你暫時不要給我答覆，我先回去看一看再與你電話連絡，好不好？」

他忙不迭的直說好，就藉故的溜回辦公室去了。
我費了千辛萬苦找到毛澤東，才把挖縣政府辦公密洞的事解決。

藉口開會實行獨裁

這件事給了我極深的感受：①共產黨的話絕不可信，不論是毛澤東、蕭勁光他們平時都是拍胸脯「保證」與我們縣政府「密切合作」，有事「找他們絕沒問題」，結果是一樁小小的挖密洞事件，他們不但不幫忙，反而扯腿。

②共產黨絕對極權、獨裁，以蕭勁光擔任「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」這職務來說，「官位」不可謂不大，在延安的共黨陣營裏，是「數人之下，千萬人之上」的大頭目。

但蕭勁光對七、八十個民衆鬧事的小事都無法解決，以「開會商議」作藉口來搪塞，可見獨裁程度之厲害。

這也是在我之前的延安縣長待不住的原因，在中共千方百計設法壓迫下，不倒向中共，就會被中共壓迫而走。

我因為「和而不同」的政策執行還算成功，使中共首腦總算對我另眼相看，才將一些中央交代的任務順利的推展開來。

我當延安縣長時，很受了些中共迫害，無緣無故被扣押到黑牢中吃了一些苦。

內人隨我一起住在延安，她家是米脂縣大戶人家，交遊極廣，內人又好客，因此，住在延安

時，經常有些中共「抗日大學」的人來找內人，圍着內人打攪她，向她宣傳一些有關中共的「好處」。

內人對國家民族觀念極其忠貞堅定，怎會受這些人所蠱惑？只是每天被這些由中共所驅使的故交舊友打攪，心中不甚愉快。中共刻意處處找她麻煩，更是使她對住在延安感到厭煩。

每當她有事進出城門，或到一些地方辦事時，總會有些中共幹部來嬉皮笑臉的問她「妳是甚麼人？來幹甚麼呀？」風言風語的說一些話。

內人很清楚這是中共的「騷擾戰術」，因此，平常不外出，免得受中共小嘍囉的氣，萬一避不開碰上了，只得好言解釋。

為此，我總覺得對不起她，但是我身為政府明令派任的縣長，對延安城負有守土之責，她心中縱有不滿，也很少對我提過。

民國二十八年年底，省府來電要我回西安參加行政會議並作報告，內人向我要求，希望能陪我一一道赴西安。

當時她正懷着頭胎，已有九個月的身孕，到西安的交通驟馬顛波，我實在擔心她受不了，就婉言勸她留在延安待產。

平日溫婉柔順的她，此刻却非常的堅持，她告訴我。

「我就是想讓孩子在非淪陷地區，我不要我們的孩子生下來就受這些赤色黨徒的氣，路上再苦，我也受得了。」

於是舟車勞頓，我們趕到西安，我參加行政會議，她住進醫院待產。

我們的長子呱呱落地，我的會議也開完了，內人跟我提起回延安任所的事。

我問她：「妳不是很討厭延安的生活以及共產黨那些人嗎？怎麼還願意回去呢？」

她告訴我：「你是縣長，縣長守土有責，開完會後本來就應該回任所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我討厭延安共產黨，但身為你的妻子，與你同甘苦，共患難是必然的事，我們該回延安了。」

二十七、八、九年共黨劣跡已逐漸彰顯的時候，要再回延安，真得具備平常人所沒有的勇氣。在內人的支持鼓勵下，我們還是回到延安，繼續展開與中共面對面的鬥爭。

回到延安情形已大不相同，政府準備將延安淪陷區五縣劃歸中共管轄，以統合全國力量來因應抗戰，中共得知消息，氣焰囂張，他們認為「天下是他們的了」，對我們這些中央派來的縣長極不客氣，一改以往彼此間和平相處的情形。

我回到延安沒多久，幾個陝北淪陷區由中央派任的縣長，就被中共藉故抓起來扣押、鬥爭，延長縣縣長周景龍、甘泉縣縣長楊烈、鄜縣縣長蔣隆延等，均被中共無緣無故的抓了起來，受到凌虐迫害、鬥爭、公審。

我看到這種情形，心中頗為猶豫，以縣長守土有責的職責言，我有必要守在延安，但是如果我守在延安因而被扣、被鬥、平白犧牲了，對國家又有甚麼好處呢？

當時發生三件事，使我暫時離開延安。

首先是中共鬥爭矛頭找到了我的頭上，我回到延安，突然間在延安城南郊外，發現一具屍體。

在中共盤踞的地點發現屍體不算甚麼？中共天天殺人，天天都有人因受不了中共的迫害而自殺。我根本沒把這事放在心中。

熟料，平常殺人如麻連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中共，這次却對這具屍體大作文章，他們到處宣傳說這個人是被「國民黨特務所殺」！

我想，這又是中共「仇恨政府」的宣傳花招，羣衆教育的新名堂。

幾天後，共酋王明（陳紹禹）居然派人把我請了去，問我可知這麼一件事？

我當下倒吸一口冷氣，知道麻煩上身了，因為別看王明問得挺客氣，但骨子裏可惡毒的很，當時他們已經藉著宣傳肯定那具屍體是「國特」所殺，我是延安當地國民黨最高負責人。因此，王明表面上客氣問我，其實就是在暗示我得爲這具屍體負責！

我怎能如此輕易的即被中共這樣栽贓？

我立刻嚴正的回答：

「王先生！雖然我是延安縣長，名義上是此地的最高行政負責人，但是你我都很清楚，延安的治安可是由你們共產黨在負責，有人被殺，緝兇、治安的問題應當由你們負責。」

我就事實狀況反駁王明的問話，王明當下滿臉堆笑的回說：

「高縣長：我們倒不是說人是你殺的，只是外面『人民』都在傳說這是『國特』下的毒手，你畢竟也是國民黨在此地的最高負責人，我們總得和你溝通、溝通；了解、了解。」

這口氣分明是想硬將這事栽贓在我頭上嘛！

我不得已，只好說：

「我是延安地區的縣長及國民黨的負責人，這點是大家都知道的，然而大家也知道我高某人作事向來公正，絕不會偏袒國民黨員，這點你們的『毛主席』也知道得很清楚，所以你想我會與這件事有關係嗎？」

王明看到我如此的不畏懼他，而且又提出毛澤東作擋箭牌，也就不敢再逼我，而自找臺階下臺的說：

「對呀！毛主席也說你不會作這種事，請你來只是了解一下狀況罷了；沒事、沒事；哈！」就這樣，我們打着哈哈彼此告辭，回到家我才發覺，身上已是一身冷汗，內衣都濕透了。我知道，剛才若是應對稍有不對，我必是階下囚，不可能再回到家中。

中共將鬥爭的矛頭對準我，是第一個使我想暫離延安以避風頭的原因。

使我非得離開延安不可的第二個因素，則是因爲當時陝北第二區行政專員何紹南辭職，由包介山繼任，包專員希望我能與他一晤，以便了解延安等地的真實狀況如何，爲了本身職責，我也有這個責任與義務離開延安，去與包介山專員一談。

第三個原因則由於內人回到延安後，奶水始終不足，延安城內又找不到奶媽哺育小兒。

爲了孩子的健康着想，內人與我決定回到她的娘家米脂縣去。

我們幾經商量，決定離開延安一段時間，一方面我向包專員述職，同時送內人回米脂養護小兒。

兒。

內人當時還年輕，我怕年輕女子在淪陷區長途跋涉會有問題，決定先由我護送她到米脂娘家，我再去看包專員，風聲平靜時再回到延安。

熟料，這一送就送出毛病來了，當我與內人帶著小孩出了延安城，一路上真是荆棘重重，使我們有寸步難行的痛苦。

沿途中共不斷的派人打攪我們，對我們夫婦兩加以「調查」，阻攔我們的行程，中共小嘍囉每次攔住我們夫婦倆時，總是很兇惡的責問我們：「爲何要出延安城？」

內人總是很委婉的告訴他們，因爲她生了頭胎，在延安沒有人照顧，所以才要回米脂娘家。共幹立即兇悍的問：

「那高縣長爲何又要陪你回娘家呢？」

內人說：「我二十左右的女孩回娘家，總是要先生陪著，難道先生陪著回娘家也犯法嗎？」

那些小嘍囉們聽了內人的回答後，嬉笑著說：「先生陪著太太那當然是可以，不過，高縣長這個時候出延安城，就不免讓人懷疑他不是棄職潛逃了！」

原來，民國二十八年左右，中共在經過一番喘息休養，勢力已經開始膨脹，對陝北區的控制日益嚴厲，政府因對日抗戰進入最艱困的時刻，將大部分力量來抗日，陝北的政府力量幾乎趨向真空狀況，中共便更形囂張狂妄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有一些陝北陷區的縣長就不敢再繼續留在陝北淪陷區內。

這些小嘍囉們因而懷疑我要棄職潛逃，對我

們夫妻倆特別兇惡。

刻意栽贓黑窩囚人

我身為縣長，深知縣長「守土有責」，沒有中央的命令，絕不可潛逃，這些小共幹未免太小看我高某人了，因此我對他們的懷疑嗤之以鼻並嚴正的告訴他們：

「連毛澤東都不會懷疑我要棄職潛逃，你們有何資格來問我？」

一路被盤問一路走的回到米脂縣，我以為沒事了，可以卸下妻兒的擔子再回延安城，孰料中共幹部却不准我們進米脂縣城，將我們的行李給扣了起來，我個人更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抓了起來，關進黑窩洞中，過著暗無天日的囚犯生活。

我被關起來禁止接見任何人，我蹲在黑窩洞內一籌莫展，幸好內人在我被關後，立刻四處向人求救，才使我沒有被那些共幹害死在窩洞中。內人娘家在米脂縣是大戶，米脂上上下下都很熟，在問及為何中共要扣押我的時候，有人偷偷告訴內人，是駐在綏德的共酋王震下令押我的。在知道是誰找我麻煩後，內人就央請她一位極有名望的表兄老共黨高敏夫向王震求情，請王震放我。

王震神氣得很，他說：「高某人是棄職潛逃，縣長守土有責，他的罪過可大的很，絕不能輕易放人！」

王震裝得這麼大義凜然，其實根本沒這一回事，不要說我不會棄職潛逃，就是我真的棄職潛

逃，自然有省政府及中央的長官依法加以懲罰，王震他只是共黨的頭目，憑甚麼抓我、關我？

我心知肚明，這只不過是中共另一種逼迫、壓榨我的方式。

因為我在延安當縣長始終不會同流合污，對共酋們雖親切，但絕不苟同他們的叛國行為，毛澤東會數度誘惑我，希望我「參加他們的陣營」，都被我嚴正拒絕了。

毛澤東組織所謂「邊區參議會」時，曾聘請我作「邊區議員」，我對這種「名器」是毫不在乎，根本不受毛澤東的利誘。

因而他們才想以威嚇的方式來取代理誘，由王震出面抓我下獄，他們以為我會就此屈服，倒向中共的一邊。

我怎麼會是這種人呢？不要說我絕不會向中共屈服，就是內人雖是一個弱女子，也是絕不向強權惡勢力低頭的。

在得知王震這種蠻橫的態度後，內人毫不恐懼氣餒，她知道，再怎麼找王震談也不會有用，

必須要另外想辦法救我。拖著個小孩子，內人四處想辦法，除了繼續請米脂親友奔走營救外，更直接打電話給毛澤東，將我無辜被扣押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訴他們，希望他們能儘快想辦法救我，免得時候我會遭遇不測。

毛澤東立刻回電給我並電王震，說：「高縣長盡忠職守，絕無潛逃行為」，桀傲不馴的王震，根本不理毛共中央的訓令，仍然扣著我不放。

王震所以連中央命令都不管，硬要扣著我的原因，乃是因為當時他在米脂、綏德一帶剛好進行過一場叛亂行動，他把當地的保安團所有人馬全部繳械、扣押，他擔心我是中央派來支援當地保安團的人，因此才想以「棄職潛逃」的罪名扣在我頭上來處置我，使我百口莫辯。

不過，我又怎能束手待斃呢？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厭的好書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讀者祇收90元。